



牛津大学
自然史博物馆的
寻宝之旅

〔英〕凯特·迪思顿 〔英〕佐薇·西蒙斯 著
(Kate Diston) (Zoë Simmons)

吴倩 译

目录

P001	●	引 言
P021	●	入场曲 《渡渡鸟加伏特舞》
P023	●	第一段旅途 生命留下的珍贵印迹
P129	●	途中小憩 地球的沉默记录者
P143	●	第二段旅途 博物学家的逸闻与足迹
P211	●	愉快道别 科学殿堂的屋顶
P217	●	致 谢
P219	●	术语表
P221	●	译名对照表
P227	●	延伸阅读



引言

自大学博物馆（后来的牛津大学自然史博物馆）于1860年开放以来，其所有活动都秉持科学发现、思想挑战与创新学习的核心精神。作为世界上最早专门建造的科学博物馆之一，这一独特场所致力于收集和保存各种来源于自然界的事物，以及向公众传授相关知识。在经历约一个半世纪的时光之后，博物馆的这项使命仍在继续。从教育和研究到收藏和公众参与，这项使命是博物馆所有工作的动力源泉。

回到19世纪40年代博物馆构思之初，当时牛津大学的科学藏品主要存放在位于宽街的老阿什莫尔博物馆（现在这里已改为牛津科学史博物馆）。藏品中包括特拉德斯坎特系列藏品，其中就有闻名世界的渡渡鸟标本。还有其他近代读者和学者收集的标本，比如著名地质学家威廉·巴克兰（1784—1856）和昆虫学家弗雷德里克·威廉·霍普（1797—1862）等人。他们的名字随后将多次被提到。

除了老阿什莫尔博物馆的馆藏，博物馆中还有来自牛津基督教堂学院和博德利图书馆的精美科学标本，以及来自其他许多大学和机构的小型藏品，这些藏品原本被存放在当时十分常见的

左图：大学博物馆，1860年，由J. H. 勒科克斯雕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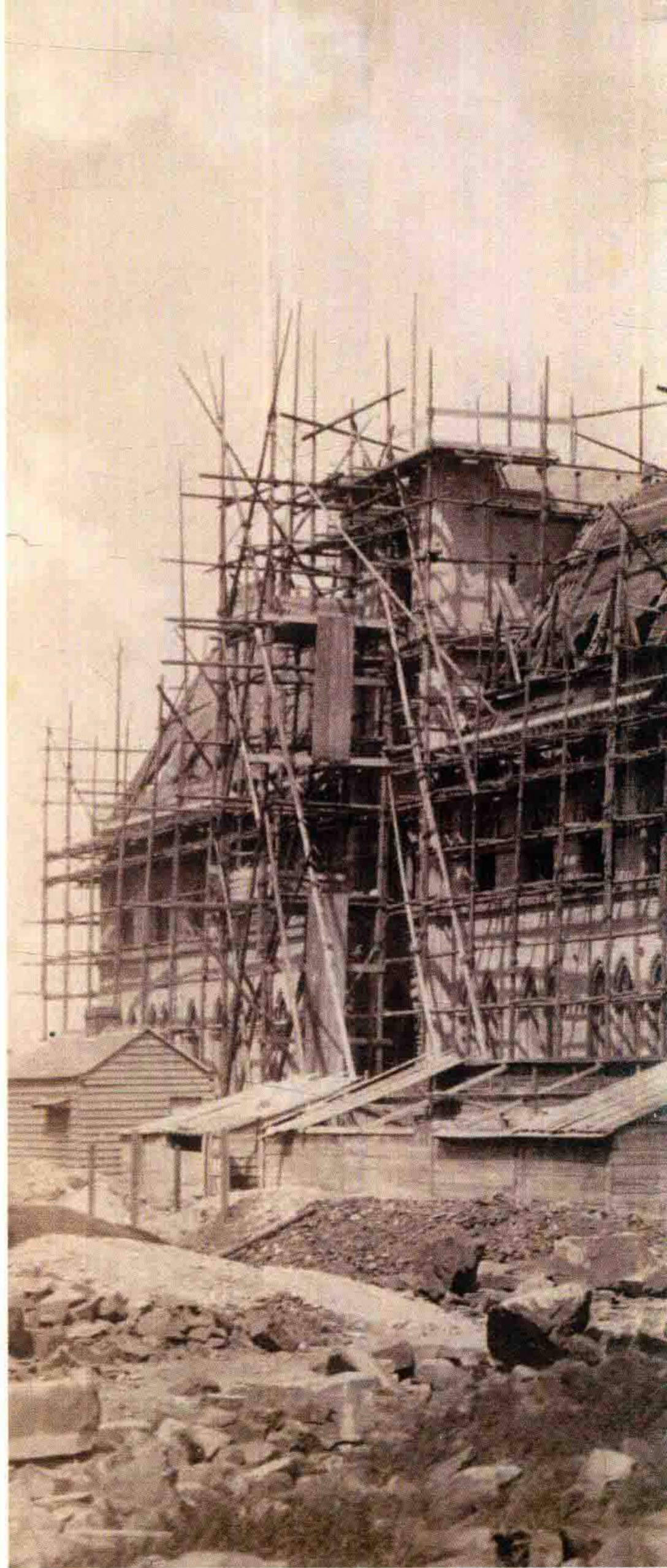
次页图：19世纪50年代，博物馆建造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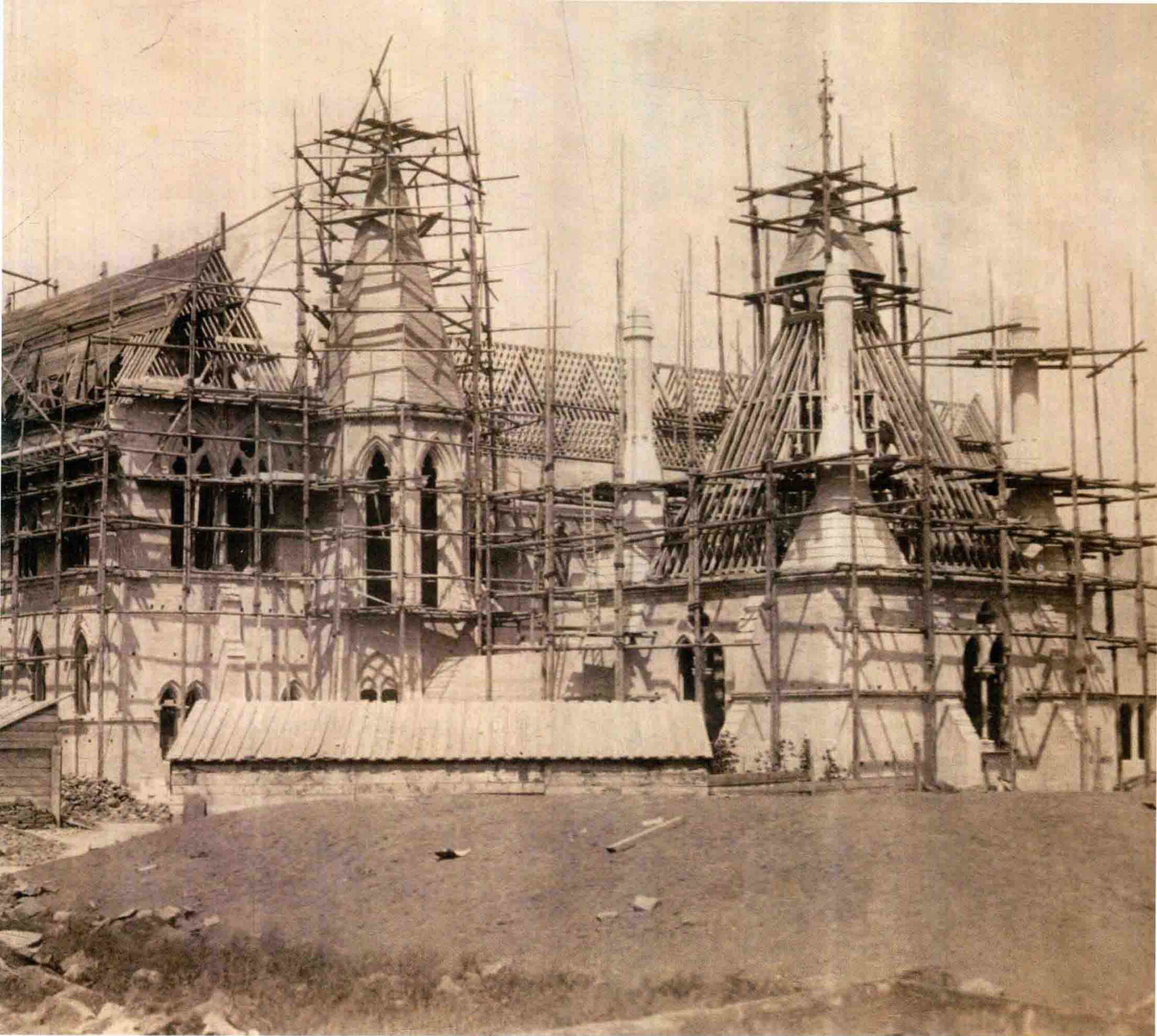
“珍奇屋”中。那是一个新物种大发现和自然知识大发展的时代。随着学术界的注意力开始转移到新兴的自然科学研究，再加上这些分散收藏的标本没有得到妥善保养，牛津大学开始呼吁为这些珍贵的科学藏品建造一个新的家园。新的博物馆不仅要为藏品提供恰当的存放场所，还将成为牛津大学的科学教育和研究中心。

建造新博物馆的意愿得到了解剖学教授亨利·温特沃思·阿克兰的大力支持。他强烈地感觉到，牛津大学的所有学生都应该有机会接受自然科学方面的教育。^①虽然1847年提交的申请被拒绝了，但1849年牛津大学终于投票通过了建设新的博物馆的提议。1854年，牛津大学为博物馆的建设投入了4万英镑，并通过竞赛的方式确定这个新的科学殿堂的建筑设计。当时共收到了32份建筑设计稿，最终的获胜者是年轻的爱尔兰建筑师本杰明·伍德沃德。他根据比利时中世纪的布料厅立面进行了设计。受到约翰·罗斯金（1819—1900）设计理念的强烈影响，装饰特征成为这一设计的重要部分，也是十分昂贵的部分。

在科学的学科发展史上，这无疑是一个重要的时期，不仅是在牛津，更是跨越了整个欧洲大陆。新的学科不断建立，大学中的科学藏品也不断增加。当博物馆于1860年正式开放时，它已经涵盖了牛津大学当时所有的理科类别：天文学、几何学、实验哲学、矿物学、化学、地理学、动物学、解剖学、生理学和医学等。这些科目的名称至今仍书写在低层展馆的办公室门上，虽然

^① 牛津大学的历史传统偏重于神学、哲学、历史学等人文学科的教育。——译者注







左图：1893年，博物馆创始人亨利·温特沃思·阿克兰和约翰·罗斯金（萨拉·安杰利娜·阿克兰摄）

现在这里已经是运营、公众参与、信息技术和主管等许多现代博物馆职能部门所在。很难相信，世界上一些最著名、最有影响的自然科学领域竟始于这样一个简单的房间，但博物馆确实迅速地成为牛津大学的科学中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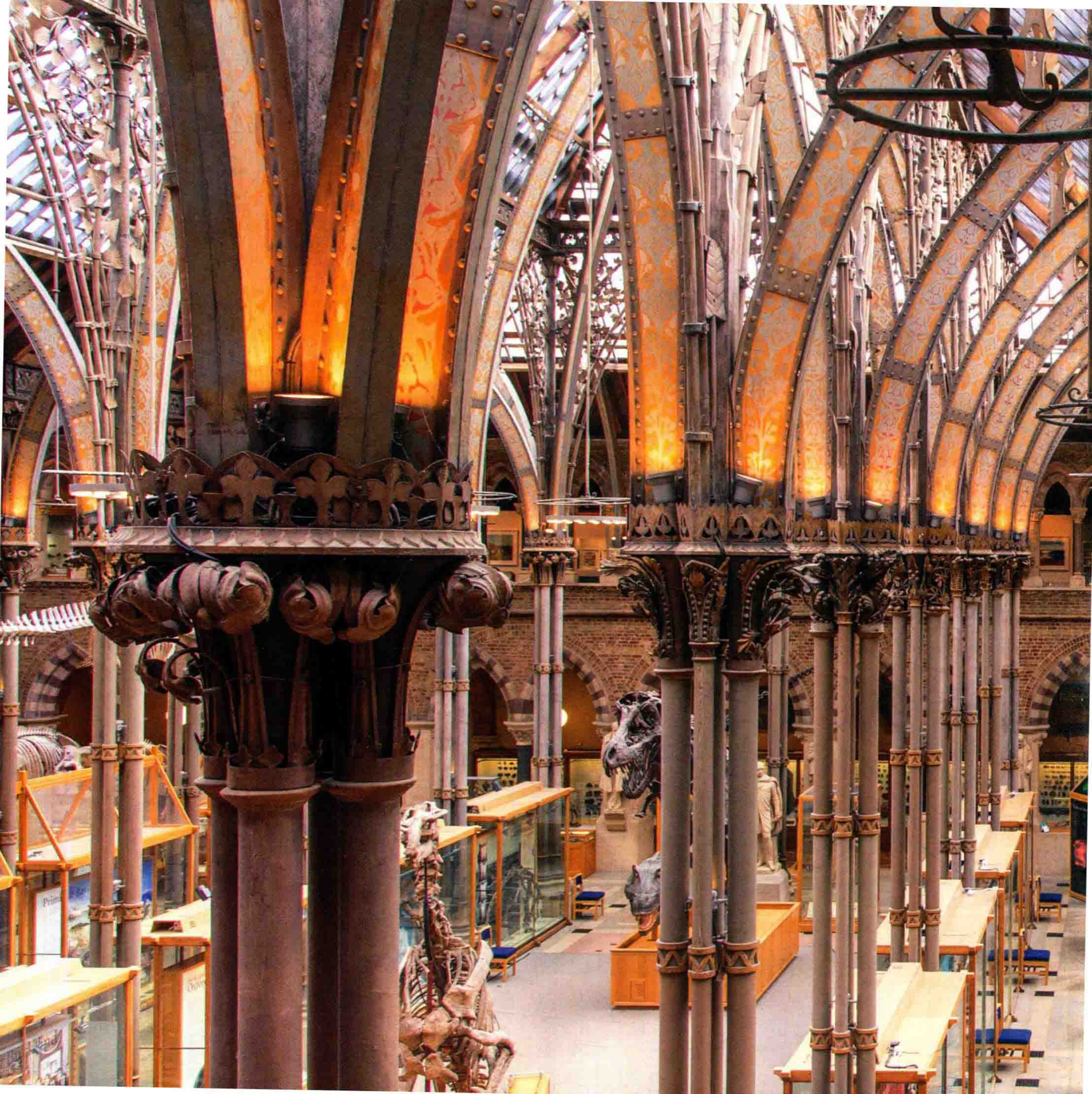
没过多久，这座小小的建筑就已经装不下蓬勃发展的自然科学了。新兴的科学院系不断地搬出博物馆，搬入环绕着快速发展的科学园区特别修建的学科大楼里。但众多藏品仍留在博物馆，维持了博物馆与新兴科学院系之间的联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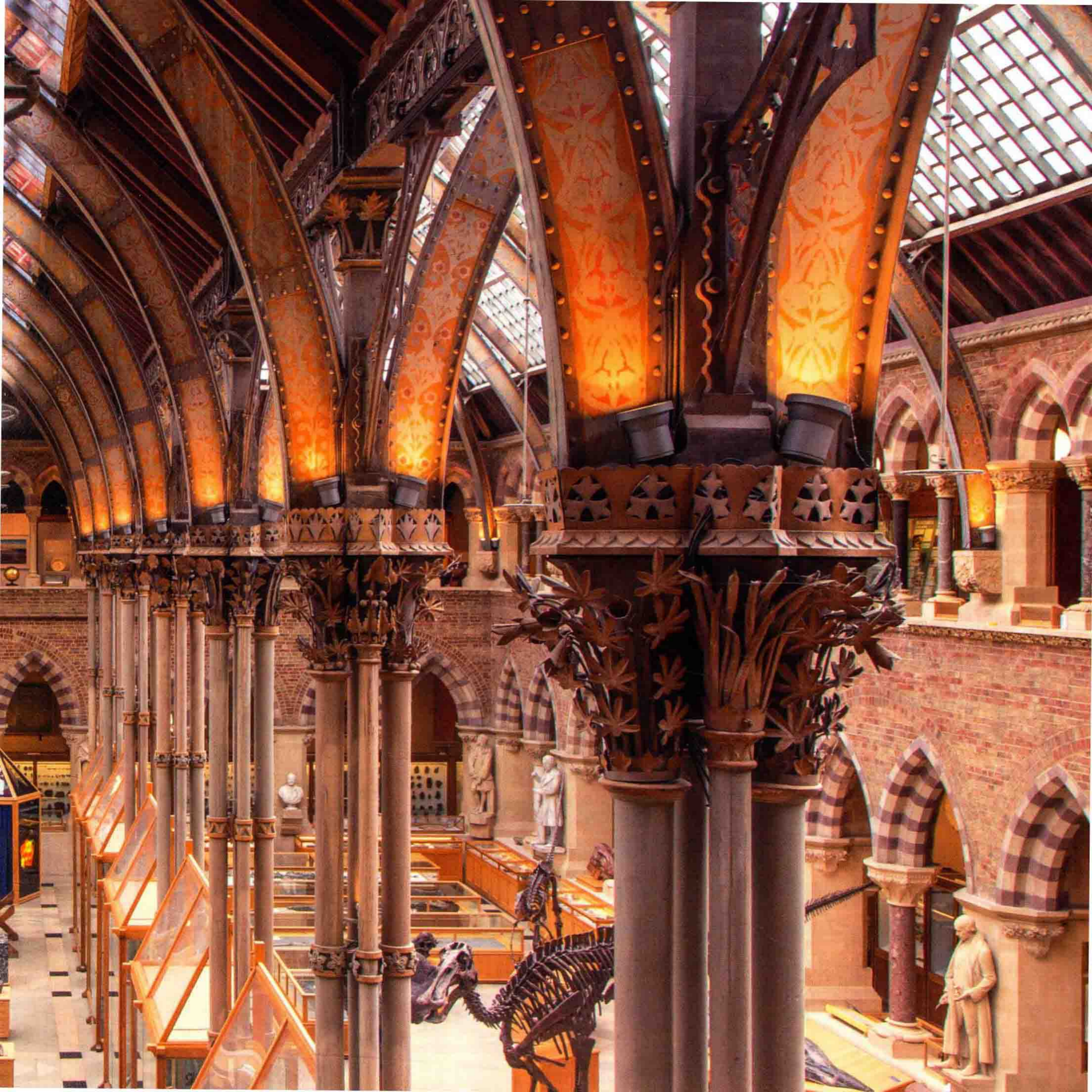
虽然众多自然科学院系不再以博物馆为家，但博物馆仍然是牛津大学的自然科学中心。在研究领域，公众参与的重要性日益增加，大学的博物馆正是能够以趣味与意义并存的方式传播科学的独特场所。虽然这在科学领域可能是一个新的发展趋势，但博物馆已经拥有了讨论甚至争辩前沿科学的长期历史。博物馆历史上最重要的事件之一，就发生在其正式开放的同一时期。

1860年6月30日，英国科学促进会在博物馆举办了年会，查尔斯·达尔文当时新出版的《物种起源》一书无疑是大家想要讨论的焦点话题。虽然无人记录讨论的具体经过，但世上从此留下牛津主教塞缪尔·威尔伯福斯与号称“达尔文的斗牛犬”的

伦敦生物学家托马斯·赫胥黎之间激烈交锋的传说。这场被后世称为“大辩论”的争辩标志着从宗教统治的思想向科学认识自然界的转变。进化论曾是最受争议的理论之一，而这次辩论也开创了博物馆传播新兴科学思想的先例。

一些著名收藏家的名字将在本书中一遍又一遍地出现，包括：查尔斯·达尔文、威廉·巴克兰、玛丽·安宁（1799—1847）、威廉·约翰·伯切尔（1781—1863）、亨利·温特沃思·阿克兰、约翰·奥巴代亚·韦斯特伍德（1805—1893）和弗雷德里克·威廉·霍普。他们和许多其他人在自然科学的发展过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不仅亲自收集了大量的标本，还为标本藏品汇集和在不同的研究人员之间交流，以及分散到英国各地的博物馆和机构之中做出了重要贡献。无论好坏，他们的遗产都帮助我们塑造了对自然和环境的看法。我们对物质文化的认识与他们的性格密不可分，这就是他们当时的影响力。然而还有一些人，比如摄影师和双翅目昆虫学家埃塞尔·凯瑟琳·皮尔斯，虽然他们的故事可能已经散佚在历史中，但他们同样对自然科学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只要有可能，这些都会被从各种档案和标本中挑选出来，用于揭示藏品背后隐秘的美景与奇迹。





能够从博物馆及其藏品中受益的可不只是自然科学领域的研究人员，作家和艺术家也为这些精妙的标本痴迷。渡渡鸟尤其激发了人们的想象，启迪了从贾斯珀·福德到刘易斯·卡罗尔等许多新老作家。凯瑟琳·蔡尔德、珍妮弗·马西森等许多当地的艺术家和前驻校诗人凯莉·斯温等，仍在不断据此创作和展出新的插画及其他艺术品。有一首《渡渡鸟加伏特舞》改编自刘易斯·卡罗尔的《龙虾四对舞》，是专门为本书创作的，目的就是颂扬通过接触博物馆及其藏品而在更广阔的世界中激发出的多彩的创造力。

今天，虽然博物馆所秉持的精神从未改变，但许多其他方面已经有所不同了。藏品的保管方式已经得到了大幅改善，工作人员在标本存放的过程中使用了许多现代材料，也对环境状况进行了监测，以确保标本能够完好地传递给子孙后代。新的技术被应用在记录和保存藏品信息上，以便它们呈现在全球更多人的眼前。现在，博物馆每年接纳超过70万名参观者，远超它首次开放时人们能够想象的接待人数。不仅接待人数在增加，参观者的多样性也在增加，除了当地居民与游客，还有许多的学者和牛津在校生前来参观。博物馆不只是牛津大学科学标本的存放地点，还是激发人们学习自然史知识、推动新一代做出重要科学发现的科教中心。

这些年来，博物馆藏品的内容拓展了，关注点也改变了。现在，博物馆拥有超过700万件科学标本——最新的昆虫标本还未计算在内！其中有500万件以上是昆虫学标本或昆虫，还有大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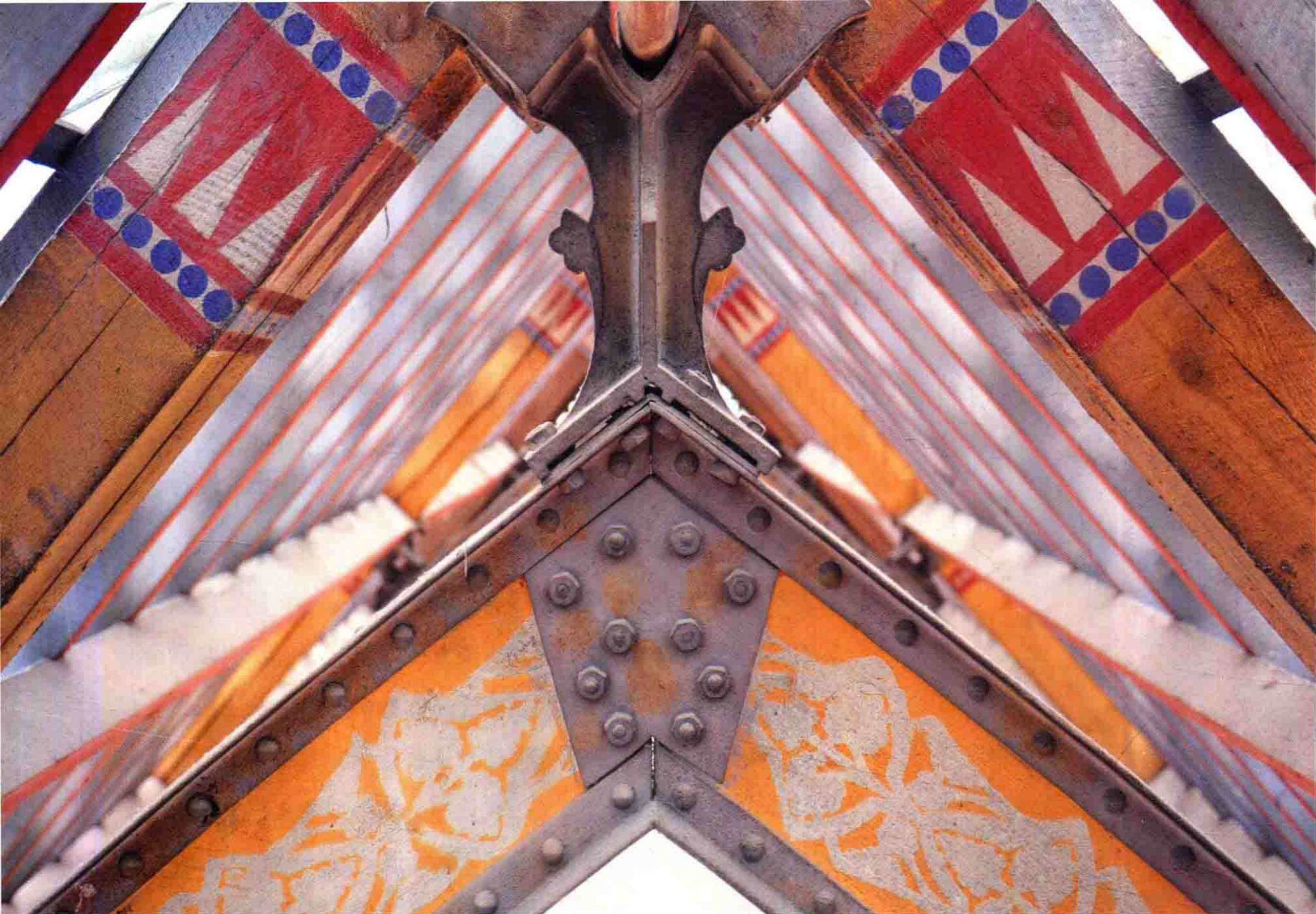
上一跨页：今天的牛津大学自然史博物馆内部

50万件古生物学（化石）标本和数量相近的动物学标本。

另外，博物馆还有关于标本藏品和历史上的重要博物学家（例如威廉·史密斯、威廉·琼斯和詹姆斯·查尔斯·戴尔等人）及其相关工作的大量档案资料。博物馆的藏品比创立伊始增加了数百万件，逐渐地填满了场馆大楼和许多外部仓库。为了确保馆藏标本和档案能够真实地反映我们今天所在的自然界，并且能够为未来的科学研究提供信息，不断收集藏品一直是博物馆的重要工作之一，至今仍在继续。

无论对现存的还是已逝去的自然而言，自然史博物馆都是非常重要且无可替代的资料库。由于在任何时段展出的藏品只是所有库存中很少的一部分，因此多数参观者并未意识到展览背后有海量的库存标本。虽然普通游客无法见到这些库存标本，但工作人员、研究者、艺术家和志愿者一直都在幕后默默忙碌着。通过研究自然史博物馆的标本及相关信息，我们能够获得许多关于自然环境和其中生命的知识。分类学研究可以极大地帮助我们了解现存有机体与生命演化之间的关系。生态学研究有助于我们理解物种分布随时间的变化模式。若无此类自然史博物馆中的丰富藏品，这些研究都将难以进行。

博物馆常常被认为是藏品固定、毫无变化的场所，但事实并非如此，尤其是自然史博物馆，它一直处于成长和变化的过程中。当我们想到采集自然史标本时，脑中经常浮现出这样的画面：一位19世纪的独立、富有的绅士，他是一名博物学家，手持笔记本和网兜站在野地里。



上图：博物馆标志性的屋顶
艺术装饰

虽然这种浪漫的场景早就不能代表今日自然科学领域的实际状况，但科学家依然在积极地采集标本。也许很多人觉得难以置信，但其实新物种的发现时常占据报纸的头条。这些新物种的模式标本或首次描述的标本通常会成为自然史博物馆的藏品，作为这一发现的重要记录，以及未来关于该物种的生物学发现的比照对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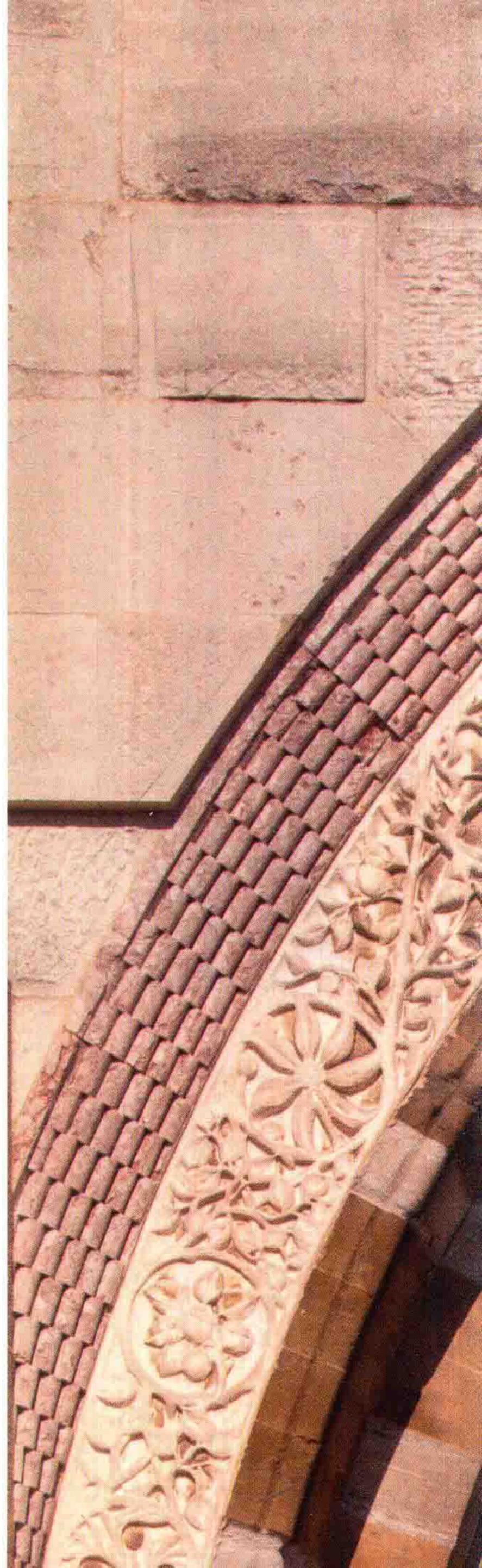
已为科学家所知并保存在博物馆中的物种只占地球上所有生命形式的一小部分，随着新物种的发现，它们被采集、记录并为更多未来的科学家所见。

本书所描述的物品从超过700万件标本以及数千件文本、物品和艺术品中挑选而出，仅能够代表馆藏标本中极小的一部分。本书展示的选品无法完全代表那些最具价值、最重要或最著名的标本，虽然确实涵盖了其中的一部分。实际上，它们全都讲述着独一无二的自然史故事，各种关于科学史、牵涉其中的新人与旧人，以及有关牛津大学自然史博物馆本身的故事。它们反映了收集和保护自然史藏品并使其为研究人员和社会所知的重要性，阐述了我们可以收集哪些信息——源自过去和为了未来的信息，关于这个我们生活在其中并成为它的一部分的自然界的信息。从欢迎参观者的博物馆大门开始，以牢固地包覆着博物馆内一切的著名的玻璃天花板结束，本书将带你在这些珍贵藏品中开始穿越时间、遨游世界的旅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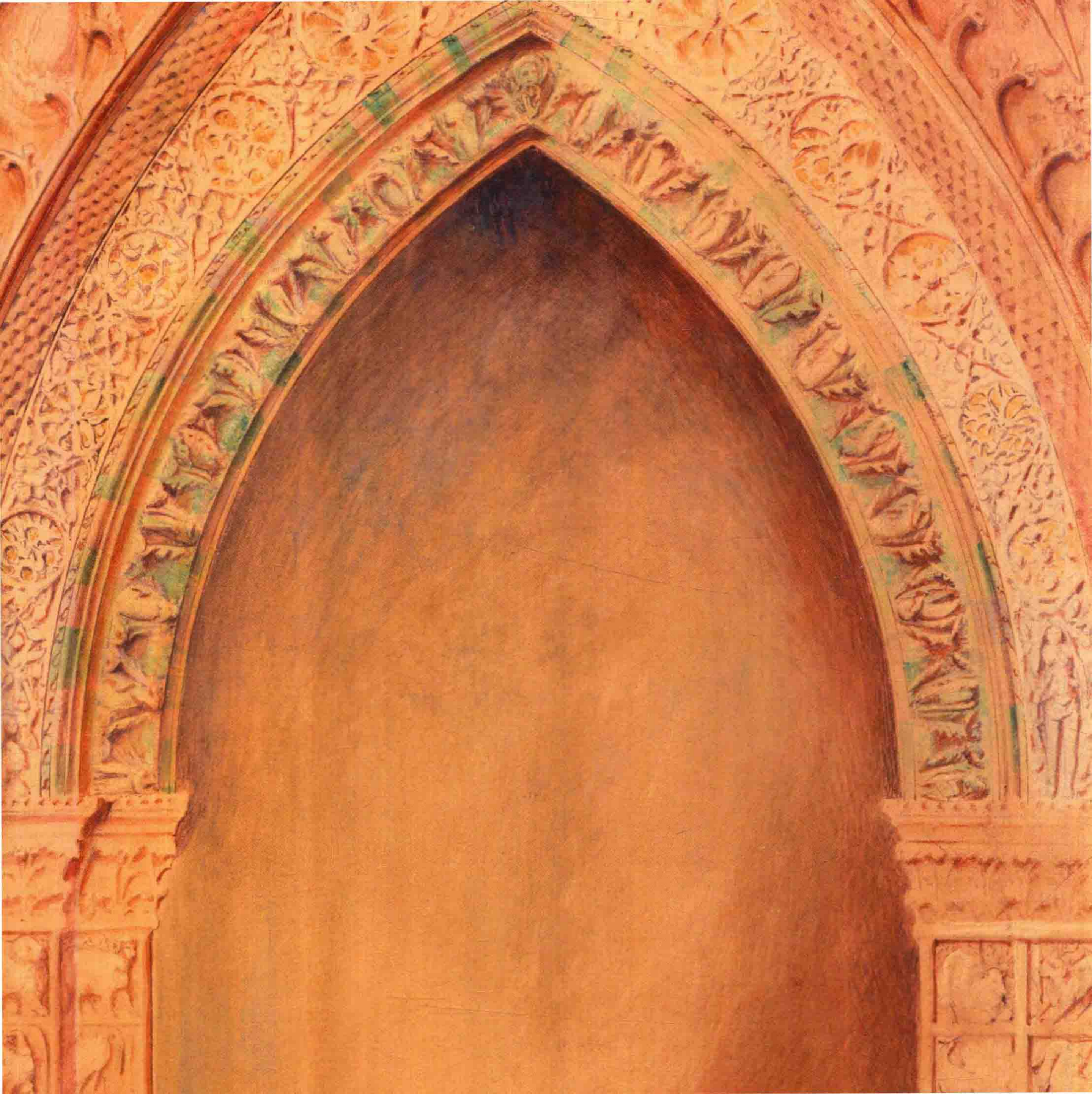
未完成的拱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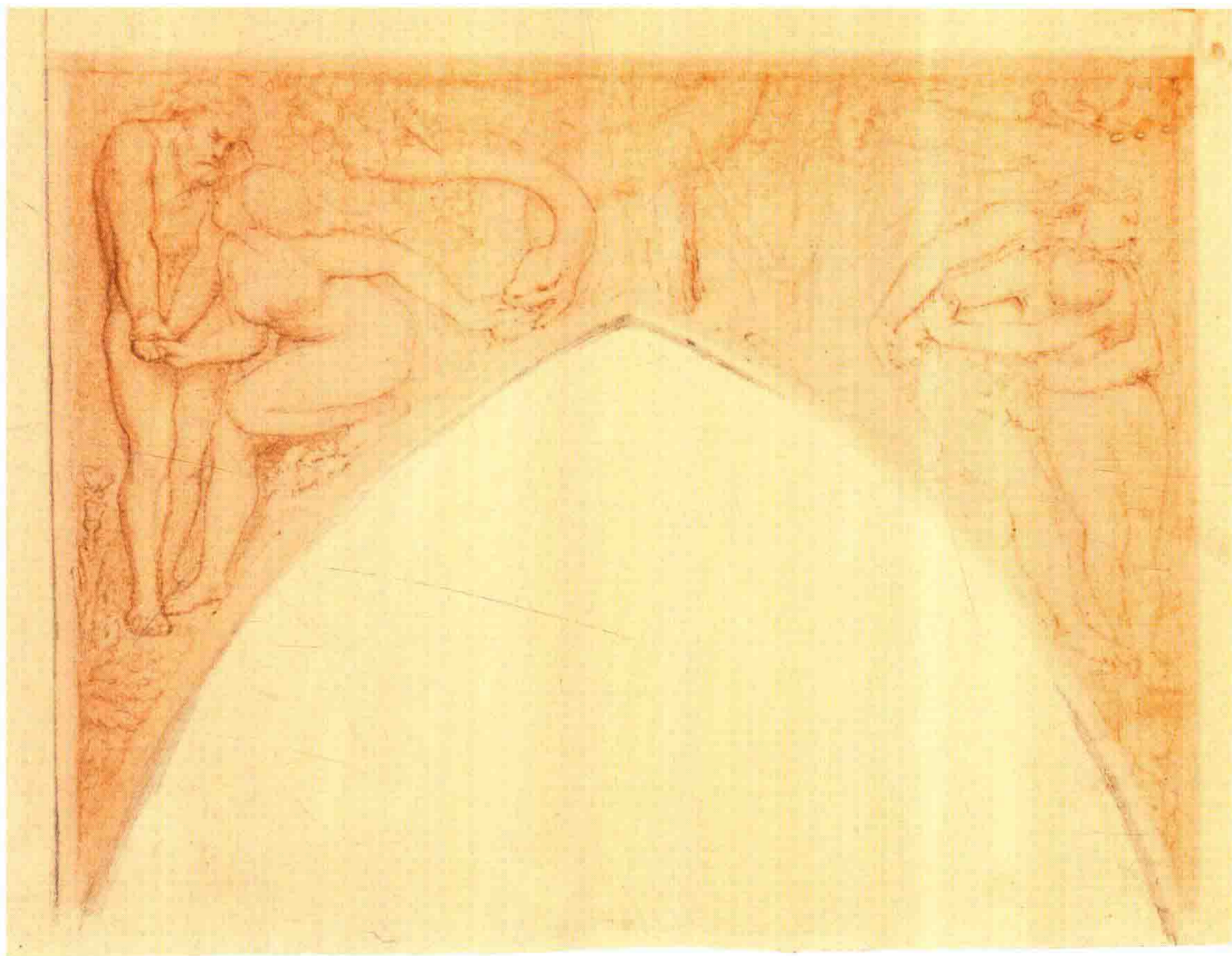
博物馆中有许多典型的维多利亚时期新哥特风格设计的装饰特征，极好地反映了其建造时期的地域特点。其中许多特征受到一些拉斐尔前派艺术家及博物馆的支持者约翰·罗斯金的影响，后者曾与牛津及牛津大学联系密切。虽然漂亮的玻璃屋顶等许多结构能够将设计付诸实践，但由于资金匮乏，还是有很多设计内容无法实现。博物馆的建筑师和设计者在建造罗斯金和阿克兰的“科学殿堂”时试图加入的细节，要比预期中昂贵得多。

其中一部分从未完成的设计就是博物馆的拱门。当时有两种关于拱门的设计方案，第一种出自拉斐尔前派的创始人之一托马斯·伍尔纳，而第二种由伍尔纳及与其同时期的约翰·亨格福德·波伦共同提出。这两种设计都包含宗教肖像符号，尤其是亚当和夏娃。第一种设计被完全弃用，这很有可能是因为它没有很好地将宗教与科学结合在一起，仍然通过传统方式表现亚当与夏娃由于追求真知而被赶出伊甸园。第二种设计得到了部分实现，它同样使用了亚当和夏娃的形象，但将一个天使置于顶部，天使手持书本和生物细胞。曾有传闻，说受雇前来完成这一复杂雕刻的爱尔兰石匠詹姆斯·奥谢和约翰·奥谢由于制作了门廊中的其他石刻而被解雇。然而，实际上两人是由于大学资金匮乏才离去，留下尚未完成的作品。









毋庸置疑，对于很多维多利亚时代的科学家而言，基督教信仰和价值在他们的生活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但是，伍尔纳和波伦的设计证明，在这座博物馆的设计者心中，科学和宗教这两种对立的思想同等重要，而且在他们探索自然界的过程中，科学的重要性逐渐增加。